



命下该食六合米

阿婆常常给我讲古（故事）。我最喜欢听她讲“三斤狗”的故事。

她说，从前有个三伯公，也姓李。她的儿子过了番（出了国），一去十几年，没有音讯。三伯公孤苦伶仃，十分穷苦。天长日久，族里人不按照他的辈分称呼他了。本应该喊他三哥、三伯、三伯公的，却都喊他三斤狗。因为他很瘦弱，个子又矮细（小），穿得破破烂烂的。有一年年三十的下半夜，他儿子突然从南洋回来了。大年初一，来不及准备三牲来祭祖宗，就用银元来代替。一盘一盘的银元，摆满了好几张桌子。上半夜的时候，大家还称呼他“三斤狗”，到了下半夜就都改口叫他“三伯公”了。后来就传下来一句话，叫做“上夜三斤狗，下夜三伯公。”

阿婆常对我说，我们家从前也是很穷很穷的啊，你阿公三兄弟都是赤手空拳出去的，要不是别人帮助，去了印尼，自家勤俭，会做生意，才有了钱买了点田，盖了集成楼这么大的屋。做人要行善，要帮助别人，不要看不起穷人家。



我开始还以为阿婆讲的只是一个传说，以后才知道是一件真人真事。三伯公是梅县松口小黄沙村的李屋人。

到溪角李姓家族中，只有阿公兄弟四家人在印尼发了财。老屋有个炎叔公，是阿公的叔伯兄弟。听阿婆讲，他很早就过了番。走以前娶了老婆，我叫她炎叔婆。从我记事，炎叔婆就是一个人生活。听说，炎叔公走的头两年还来信，寄回一些钱物。以后就没有音讯了。

炎叔婆长得单皮薄肉，白白净净、细细嫩嫩，眉清目秀。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小，很和善，总是笑咪咪的。叔婆没有儿女，守着家里的几丘田、几间屋，种稻栽薯，喂猪养鸡。

我从小跟着阿婆，阿婆走到哪，我跟到哪。我跟着阿婆、叔姆、阿嫂们去白宫墟赶集，回来的路上，我走累了，就要阿婆背，炎叔婆替阿婆背我，我不肯。炎叔婆就说：“你就不怕把你阿婆累死啊！”她这么一说，我也就不再闹了。

我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叔婆，常常去老屋看她烧火做饭。这是她一天中最空闲的时候。叔婆在老屋只有一间住房和一间厨房。每家厨房的格局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一进门的右手边是小炉灶，挨着小炉



灶的是堆放柴草的“灶公阁”。再往里去便是坐着两口大锅的大炉灶了。大炉灶顶端的墙面上贴着灶公的像，像下面钉着一块横木板，木板上面摆着香炉和烛台。灶公阁右边是厨房的一扇墙壁，左边是垒起的一扇矮墙。坐在矮墙上就可将柴草送进炉灶。厨房的左边，靠墙放着四条腿的长木桌，木桌上可以用来放碗筷。墙角有一口大水缸，用木板盖子盖着，盖子上放木勺。

炎叔婆坐在矮墙上，把长长的薯基（柴）塞进灶口，见我来了，便笑吟吟地招呼我说：“阿莉，过来，这里坐。”我挨着她坐下，看她烧火焖番薯。长长的薯基烧短了，叔婆就用火钳夹着往里送。在放柴草的灶公阁和灶口之间有条窄沟，烧火时，柴草的碎末和灰粉就掉到沟里。叔婆不时地用火钳把掉进沟里的碎柴根夹起来送进火炉里去。

炎叔婆也会讲古（故事），讲古子的故事。

“古子”名叫李文古，是明朝末年梅县丙村的一位很有才华的秀才。明朝灭亡以后，他不满清朝统治，隐居不仕。清朝沿袭明朝的开科取士的制度，不少人不愿意参加考试。为此，满清朝廷制定了特别的法令，规定凡是明朝的士子，一律不得逃考。李文古不得不去考试，又不愿考上，于是每年科



试，常故意玩弄笔墨，借题发挥，儿戏考场。

一次科考，考官出的题目是：“夫子于此不动心”。李文古写道：“荒山穷谷之中，黄金万两；深更密室之处，有美人一，试问夫子动心否乎？曰：动、动、动……”一连写了三十九个动字。主考官看了他的考卷，问他是何意。李文古说：“这三十九个动字，乃蕴含孔夫子所云‘四十而不惑’也！”考官听后气得将他逐出考场。

一日又遇考试，生员们都在考场中聚精会神作文，李文古突然大笑不止，主考官问他笑从何来，李文古回答说：“我正想落笔行文，忽然想到相书上说，人到了百岁（人中）就可以长到一寸，因此想神仙张果老，活了二万八千岁，那么他的人中就有二三丈长了，走起路来岂不脱垂于地，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发笑。”李文古的话引起众人发笑，他又被赶出了考场。

炎叔婆给我讲的却不是这些，而是李文古小时候的故事。说李文古上学的时候，经常喜欢戏弄先生（教书先生）。先生上厕所蹲茅坑的时候，习惯用手拉着前面的一颗小树，怕掉下去。李文古就用锄头把那棵小树刨出来，又照原样立好。先生来了，结果可想而知。还有一次，学生们要轮流给先



生送菜，轮到李文古，他就在盘子里拉了一泡屎，上面堆了一些煮熟了的番薯，给先生拿去了。李文古对先生说，这番薯可好吃了，说着就把上边那些番薯吃了，装出吃得很香的样子。先生看他吃得那么香，就接着吃下面的，等到发现上当，李文古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

我听了不明白，就问叔婆，为什么李文古要戏弄先生？叔婆说，因为这位先生经常拿鞭子打学生，李文古是为大家出气呢。叔婆说着说着，番薯焖好了，她便从大锅里拣出一块，盛在碗里，端给我吃。

她常常去看叔婆，每当碰上她正在煮番薯或芋头，她总会叫我吃两口。她用泥土在田唇（田边）筑起一个垄，在垄上种黄瓜，在垄上插上棍子种豆角。黄瓜、豆角熟了，她总会摘一些送给阿婆做菜。我觉得她种的黄瓜、豆角特别好吃，又嫩又甜。

炎叔公一直没有回来。听说，她死在印尼了。炎叔婆为了给丈夫留下后代，便从山里抱养了一个儿子，叫李跃文，我叫他跃文叔。几年之后，叔婆又为跃文叔抱养了一个童养媳，叫月云。

鲤溪村有个小学，附近村庄的孩子都来这里上



学。

跃文叔到了上学的年龄，炎叔婆没有钱供给他读书，很着急。她找我阿婆借了点钱，总算是给儿子报了名。但还要买笔、墨、纸、砚和书本，钱还是不够。叔婆就去挑担子，做脚力。

家乡有个习惯，以茶待客。不管是什么人到家里来，总是要为客人烧壶水斟杯茶。烧水用的是小蜂炉，用泥做的，里面有一个篋子。把洋铁壶坐在小蜂炉上，把木炭放在篋子上点燃，很快水就烧开了。木炭有两种。一种是自制的，烧火做饭的时候，用火钳把木炭从灶口里夹出来，放进一个罐子里，上面用盖子盖起来。这种木炭很好烧，但很稀松，烧不了多久。另一种是从白宫墟上的炭铺里买来的，一根一根粗粗的，买一篮子，可以烧几个月。

离鲤溪村十几里路远的深山里有炭窑，烧好的木炭，一根一根地插在炭篓子里。炭篓子上



客家妇女上山挑柴草。



面还有个耳朵，是用来插扁担的。扁担是两头尖的，两头插在两个炭篓子的耳朵里，就可以挑起来走了。挑担子的人只需要带上自己家里的扁担，到炭窑去，把炭挑到白宫墟上，交给炭铺，就可以在炭铺领到工钱了。

炎叔婆除了地里的活，天不亮就进山挑木炭，挑回来放在自家门口，吃点稀饭、番薯，再挑到白宫墟上。来来回回好几十里山路。

一天清早，阿婆催我起床，说：“叔婆去山里挑木炭都回来了，吃了早饭，她还要把木炭挑到白宫墟去。你要起床了，莫睡懒觉了。”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下到溪里洗完脸，急急忙忙跑到老屋下的鸡舍去喂鸡。只见叔婆的一担长长黑黑的木炭放在门口，叔婆正坐在一条木凳上食粥呢。

“炎叔婆，你早。”我向叔婆问好。

叔婆见到我，笑眯眯地说：“阿妹，你来吃点。”

“我屋下（家里）也煮了粥，也焖了番薯。”

叔婆吃完粥便急匆匆地挑起那担木炭走了。

日复一日，几年过去了，跃文叔读完了小学，出外谋生去了。听说，他先是打短工，后来在广西柳州找了一份固定工作。跃文叔经常来信，有时也



寄点钱回来。叔婆高兴极了。月云也很高兴，希望有朝一日，跃文回来同她完婚。

我在鲤溪上小学，六年级时转到梅县广益女子中学附属小学。星期六下午从梅县回到鲤溪，星期天下午再返回去。我在家的时候，炎叔婆常来找我，让我给她读跃文叔的来信，或者让我给跃文叔写回信。每次来我家，她总会提着一个篮子，篮子里放个碗，碗里放几块番薯或芋头，把篮子放在大厅的桌子上说：“阿妹，你吃。”如果我没有吃完，她便自己从厨房拿出一只碗，把食物给我留下。

“阿妹，给我写封信，写给你阿跃叔。你告诉他，我很好，身体也好，生活也可以，不要挂念。让他好好的做，不用想着我。”

我拿来笔墨纸砚，按照叔婆的意思，用铅笔把信写好，再用毛笔在信封上写好地址，封好，带到县城的邮局里去发信。

一次，叔婆又来了：“阿妹，你阿跃叔来信了，你看写的什么？”我就念给她听。“跃文叔在信上说了，你的信他收到了。他说，我在这里也都好，你也不要挂念我。我最近找了一个当地的女孩子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”过了不久，跃文叔来信，



说他结婚了。又过了两三年，跃文叔有了孩子，一男一女，还寄来了全家四口人的合影。炎叔婆高兴极了！她把照片镶在一个镜框里，挂在卧室的墙壁上，每天看。

老屋人和新屋人听说跃文娶了媳妇，都到炎叔婆家去看照片。月云也在，她用手指着照片中跃文的媳妇对别人说：“这就是那个小婆（小老婆）！”

我知道跃文叔和她没有“奔床”（结婚），觉得月云挺可怜的，等跃文叔等了那么久，也没有等上。过了几年，月云出嫁了，嫁的也是穷人家。她时常回来，帮炎叔婆做活。

跃文叔一走就没有回来，月云也走了，炎叔婆还是一个人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叔婆很老了，头发雪白，满口的牙齿也脱光了。我去看她，她依旧笑咪咪地给我拿番薯、芋头吃。我见她吃的是咸菜送粥，一点油水也没有，就说：“叔婆，咸菜拿点油来炒着吃多好，明天是墟日（集日），我去白宫下（白宫圩）给你买点猪肉，用猪肉焖点咸菜干，好吗？”

叔婆却说：“阿妹，你真有心！我已经食长斋了，不能吃荤腥。”



我说：“你年纪这么老了，为什么要食长斋呢？”

叔婆细声细语地慢慢地说：“我命水（命运）唔（不）好，十几岁嫁给你叔公，一生人（一辈子）守活寡，又么（没有）孩子福，都是命水唔好。命下（命里）该食六合（十合一升）米，你就莫想食一升。庵下（尼姑庵）的神明说我应该食长斋，求得下生人（下辈子）过上好日子。”我听了叔婆的话，心里很难过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抗战期间，生活困苦。梧桐树籽掉下来，大家都去拾来吃。有人生吃，有人炒炒再吃。叔婆也拾。

我问叔婆：“树籽这么硬，你没有牙齿，咬得动吗？”

叔婆笑着说：“拿回去放点盐煮煮就很好吃。煮熟了把它放在嘴里，用口水浸软了，再磨一磨，这不就吃下去了。”

我看着叔婆蠕动着嘴，用舌头和牙床来回费力地揉搓，真想能帮她一下。但她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处。我从没有听到叔婆抱怨过什么或者悔恨过什么。

叔婆活到了八十岁。



听阿婆说，老屋还有一个罗叔公，也是阿公的叔伯兄弟。论亲属关系，比炎叔公稍远点。罗叔公也在印尼经商，回来成婚，不久便托“水客”带罗叔婆去了印尼。罗叔婆很会服侍丈夫，茶来水到，还会做一手好吃的菜饭。丈夫对她也很好，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，生活过得去。儿子长大了，能帮助父亲做生意了，罗叔婆就一个人回来了。

我问阿婆，为什么罗叔婆一个人回来？阿婆说，家里总得有个出火烟的人（生火做饭的人），冷锅冷灶怎么行呢。按照家乡的风俗，总得留个人在家里看房、种地，把香火延续下去。飘泊在外的人将来也好叶落归根。

每次水客回来，罗叔公总会给罗叔婆带来钱或物。他做的是小买卖，本小利微，挣得不多，带回来的钱物也很少。罗叔婆忙不过来，便抱养了一个童养媳。一来有了帮手，二来也是为了远在印尼的儿子。这个童养媳叫钟道荣，比我小三岁，长得很



围身裙



白宫妇女上山、下田常戴的头裙。



瘦，也不爱多说话，但是很机灵，又很勤快。她很听罗叔婆的话，下田种地，上山割蕃基，日夜跟着罗叔婆干活。

罗叔婆，个子高高大大的，一双大大的眼睛很有神，说话办事都很爽快。她不会像炎叔婆那样坐下来给我讲故事，细声细语地同我说话，但对我很和气，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叔婆。

罗叔婆经常穿着一身乌衫乌裤。身子前面再系上一条黑色的围身裙。围身裙的两侧各一条裙带子，两条裙带在腰背后交叉着一结，垂下尺把长的穗穗。走起路来，两条长长的带穗在她笔直的腰背上摇摇摆摆，显得格外精神。每天出门做活，她头



戴头裙的客家阿婆。客家人的布衫，朴素实用，宽敞、便宜是最大的特色。普遍喜穿单色，如蓝、黑、白色最为流行。质地多为粗布。



白宫的妇人常常利用空闲时间自己编织色裙带。



自己编织的围身裙带。



戴头裙、系围身裙的客家妇女

上总要戴上一条头裙，前边镶嵌着几寸宽的双层白布，白布两侧各缝着一条一、二尺长的白带子。白带子在头上边一交叉，将头裙盘在头顶上，既能遮阳，又能挡风寒。只有在下雨天干活的时候，她才在头裙上边加戴一顶笠屙（斗笠）。

鲤溪一年种两次禾（稻子）。从落秧（播种）开始，犁田、耙田、蒔田（插秧）到耕田（中耕）、割禾、打禾，其中“耕田伢”（种田人）最忙碌、最辛苦的时节，就在蒔田和割禾前后了。这时节，各家各户的妇人家，天还没有亮就起床，在地里一直做到天黑才转来（回家），到家以后，还要烧火煮饭，喂猪，关好头牲禽畜，照料子女和老人。这么多的活计全靠妇人家（妇女）。

罗叔婆插秧是一把好手。插秧之前先要落秧。春天，将选好的精谷种，放在箩筐里，谷上面放一层禾草，再压上一块石板，放在溪水里浸泡。浸泡



好了，捞起放入大木桶里，桶底铺上一层厚厚的禾草，谷种在上边。每天浸几次水，几天后谷种便出了芽。把出了芽的谷抛洒在耙好的田里，不久田里就长满了嫩绿色的秧苗。等秧苗长到半尺多高，拔下来，捆成一把一把的，这叫脱秧。将一把一把的秧苗放到水田里，这才开始插秧。

我经常站在地边上看她在田里干活。见她头戴笠檐，赤脚踩在水田里，向前弯着腰，弯下去很低很低，左手托着一大把秧苗，右手取了三、五株，往水田里插。从左向右，每隔几寸就插几株，插完一把，再拿一把，像鸡啄米一样，插得可快了。插到右边，接近田埂，便又从右向左插过去。不一会儿，一片整整齐齐的禾苗就笔直笔直地立在田里了。我站在田的一边，竖着看过去，是直直的一排。我又跑到田的另一边，横着看过去，也是直直的一排。我也见到过插得不好的，每株苗的距离不那么均匀，有近有远；苗站得也不那么笔直，看起来东倒西歪站不稳似的。整个看上去感觉有点乱。阿婆常对我讲：“要学罗叔婆。”

罗叔婆还是一个很好的使牛师傅。耕种最辛苦的活是犁田、耙田和耕田了，干这种活都要使唤牛，驾御牛的人便被称为“使牛师傅”。使牛师傅



都是年轻力壮的妇人家。耙田用的大耙，有一、二十斤重，耙上有一、二十个七寸长的铁刺，排成一行，活像一把很大很大的铁梳子。耙的一头焊着两根铁棍，铁棍有半人多高，它们上端横着安上一根光溜溜的棍把。这棍把好比是车上的方向盘。耙田时拐弯转角都要靠它了。耙的两端各焊着一个弓形的铁棍，可以使耙稳稳地立在地上。

罗叔婆来到田里，放下肩上扛着的耙，让牛站在田边，给牛脖子上套上牛轭。这牛轭是个弓形的木架子，两边绑着两条长长的结实的绳子，分别联结在耙子的两边。只听罗叔婆吆喝了一声，牛便前行，她把耙齿插在水田里，跟在牛后面。走着走着，有禾根挂在耙齿上，她就双手抓住棍把，将耙抬起，禾根便脱落在田里。她耙到田那边，提起耙继续往回耙。直到把整个田地，耙成平平整整的泥潭才算好了。过深了耙不动，过浅了耙不好。除了双手扶耙把，还要牵牛绳，使牛鞭。在我看来，这太难



白宫的妇女就是这样打赤脚干活，也就是这样一手扶犁把，一手牵着牛，驶牛犁田。



客家妇女历来天足，既做家务，又做农活。你累不累？腰骨痛不痛呀？”

了，但罗叔婆却运用自如。

我看罗叔婆干得辛苦，就问：“罗叔婆，你累不累？腰骨

叔婆说：“累，有什么办法呀，要食饭呀！没有关系的，晚上洗个热水澡，食饱了，好好睡上一觉（音gào）目（睡一觉），就不累了！”

我又问：“叔婆，你耕田的本事这么大，这么好，是谁教你的呀？”

叔婆笑着对我说：“自家（自己）看人家怎么做，自家就用心去学，去做，天长日久就会了，懒疏嫲（懒惰的女人）就学不会！”

叔婆的话不多，但总说的很有道理。

我阿婆年岁大了，不能种田了。每到播种都要请使牛师傅帮我们家耕田、耙田。请使牛师傅一日两餐两点心，每天四毫子（四毛钱）。两餐都是大米饭，炒两个菜，菜是从自家园子里采摘的，有时候菜里还有点肉。上午和下午干活间歇的时候，阿婆会跳着担子把点心和碗筷送到地里，还有用布惊



子（牡荊）子煮的茶水。使牛師傅在田邊，用小水渠里的水洗净手脚上的泥，坐在田頭吃點心。點心一般是卵（蛋）煮粉，或者是紅糖綠豆粥，或者是番薯、芋頭。

阿婆經常請白慕下的鐘阿玉大嫂和老瑾大嫂來耕田，她們都是我們的鄰舍。她們耕田的時候，阿婆就會提個籃子到地里去，我跟在她後面。犁頭犁過，半干不濕的泥土便被翻卷在一旁，被翻卷過來的泥土里不時有蚯蚓在蠕動，阿婆跟在使牛師傅後面，把蚯蚓拾在籃子里，拿回家喂雞、喂鴨。阿婆說：“雞鴨吃了蚯蚓，好生卵（蛋）。”

羅叔婆的童養媳鐘道榮，每天早上下溪里挑水。大人們使的铁桶，她挑不動。羅叔婆就為她準備了兩個小洋铁桶和一根小扁担，挑起來就輕鬆多了。她跟着羅叔婆學種菜，學插秧，還跟着去“作水（引水）。”開一條小溝，把渠里的水引到自己的稻田里。“作水”時要在田邊照看着。特別在天旱的時候，大家都着急灌溉自家的田，难免有人在水分道的地方搞鬼，把別人開的水溝堵住，把水引到自家的田里去。這有時也會引起紛爭，輕的吵架、罵人，重則打起架來。只要有人照看着，就什麼事情也沒有了。道榮待人很和氣，我從未見她和



别人红过脸，吵过架。

罗叔婆常在别人面前称赞道荣，说她来了以后，能够帮助她干很多活，自己肩上的担子轻多了。道荣也喜欢罗叔婆，叫罗叔婆姆姆（母亲）。道荣对我说：“叔婆是个好人，来这个家能吃饱饭。”

农闲时节，罗叔婆也不闲着，常去深山里挑煤炭、木炭，帮补家用。

罗叔婆的境遇比炎叔婆好些，尽管她们的生活一样的艰辛，但毕竟罗叔婆在印尼还有一个儿子。后来，罗叔公在印尼娶了一个小老婆，小老婆又生了两个儿子。罗叔公的小老婆是印尼当地人，家乡的人都叫她番婆。番婆的两个儿子长到快上学的年龄，罗叔公便托水客把两个孩子带回家乡，交给罗叔婆养育。

哥俩刚回来，到溪脚的人吃完晚饭，料理完自己家里的事，都到罗叔婆家去看这两个番客。我也跟着阿婆去了。大家都很高兴，李家又添了两位新丁（男后代）。屋子里点着煤油灯，显得很明亮。哥俩个子不很高，肤色黑乎乎的，都有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睛，穿着中式的大襟衫，呆呆地看着一大屋子人。罗叔婆很高兴，一一向兄弟俩介绍：“这是



二伯姆，这是三伯姆……”兄弟俩听不懂客家话，仍旧在那里呆呆地发愣。阿婆对我说：“这大的是你番文叔，小的是你幼文叔。他们都不会讲家乡话，你要多多关照他们。他们刚回来，一定不习惯，要帮助他们学会听、学会讲家乡话。要多带他们玩，让他们高兴。”我听了连连点头。番文和幼文的年龄都比我大。没过多久，“水客”又从印尼带回一个男孩子。他是罗叔婆的侄孙子，他父亲喜文叔送他回来读书，也交给了罗叔婆。这个男孩有点黑，尖尖的下巴，穿一身唐装，也不会讲客家话。阿婆对我说：“这是你万森哥。”

我和到溪角的孩子们经常去罗叔婆家，同这三位番古（在国外出生的华侨）说话。我们指着公鸡说，这是“公鸡”；又指着母鸡说，这是“鸡嬷”。他们就用印尼语说：“阿艳，阿艳。”我们指着公猪说，这是“猪哥”，又指着母猪说，这是“猪嬷”。他们就说：“哇威，哇威。”我们拿出一双筷子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双毕。”我们就告诉他们，这叫“筷只”。大家互相学习对方的话，彼此觉得好笑也很开心。

万森哥很喜欢跟我们学说客家话，而且胆子也大，敢说敢讲，说错了不怕大家笑话。大家追着



玩，有几个人往大路上跑，追的人没有发现，万森哥见到了就大声地喊：“呆郎！呆郎！”他把客家话的“太（大）路”说错了。孩子们笑着说他是“番鬼”，说他是“四脚蛇”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在国外出生的男孩子叫做“四脚蛇”。当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不对劲的事的时候，大人们也会说：“嗨，那个四脚蛇！”我想，可能是说他们有些古灵精怪（古怪），因为蛇如果长了四支脚，那不成了怪物了？

日子长了，番鬼们不但会听，而却会讲很多客家话了。

三个番古来了以后，罗叔婆的负担一下增加了许多，我见她总是没日没夜地干活，人也老了，头发也渐渐地白了。她每天早早起床，或下田干活，或上山割薅基（柴）。整天累得满身大汗，看不见她坐下来歇息。晚上天黑了她才回家，又赶紧烧火煮饭，喂猪、喂鸡、喂鸭，还要照料三个孩子。吃晚饭时，才坐下来，而后烧水洗身（洗澡），很晚才上床睡觉。

我见她太累了，心里难受，可是她从来不抱怨，也从来没听她唉声叹气过。她只是说：“命下（命里）该食六合（十合一升）米，吴（你）就莫



想食一升。”她还常说：“要想生活好一点，自家去做嘛！”

罗叔婆信佛，经常烧香拜佛。每月初一、十五都会给天神、灶君、门神烧香，希望神灵保佑罗叔公和远在印尼的儿子发财回乡团聚。但不幸的事却发生了。

一天，我见道荣孩了一担子碗筷不知道哪里去，就问她。她说，叔婆在老屋下门口的田里干活，天空飞过一只乌鸦，乌鸦拉的屎刚好落到叔婆身上，叔婆说不吉利，要施粥呢。我问，为什么要施粥呢？道荣说，叔婆说了，这样可以避邪。我听了觉得很新鲜，好奇地跟在她后面。

道荣来到三岔路口，只见罗叔婆正在那里忙着，还有一些人围在一边看。这是从钟屋、王屋和阙屋和到溪角来的三条路交叉的地方，路口边早已垒起了一个灶，灶上座着一口大铁锅，锅里倒满了水，叔婆正在那里烧水煮粥呢。粥煮熟了，罗叔婆便招呼过往的人：“食点粥，食点粥。”过往的人都是孩担子或扛木头的脚力，这些人都是三一群五一伙，一个姓一个姓结伴而来做活的妇女。她们见到了，也都知道是有人在施粥，便把担子放下。罗叔婆使用木勺给每个人盛一碗。一个人只喝一碗，



没见到有人要求再盛一碗的。

罗叔婆施粥以后没过多久，水客从印尼带来消息说，罗叔婆在印尼的儿子死了。罗叔婆听到消息，哭了，号啕大哭。她一边哭一边喊：“怎么这么惨呀！怎么这么冤枉啊！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就给我勾去了。”大家一面劝她，一面也跟着哭。我很少哭，但只要阿婆哭了，我也会哭。这回阿婆哭了，我也跟着哭了。

从此，罗叔公和番婆一直没有回来，他们在印尼身边没有一个孩子，直到去世。番文叔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。

阿婆对我说：“罗叔婆的命水不好，老公过番（出国）一去就么转（没有回来）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还没有讨老婆就病死了。”阿婆一提到罗叔婆，我便又想起炎叔婆，想起她们俩说的那句同样的话——命下该食六合米，吴（你）就莫想食一升。